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当忆颠沛有灵珠

——繆朗山先生学思述略

赵 惊

JRUCWP2024010

2024. 01. 29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当忆颠沛有灵珠

——缪朗山先生学思述略

赵 惊

缪朗山（1910—1978），笔名“灵珠”，广东中山人，曾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现为文学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学者、翻译家。先生学贯中西古今，通晓西方古典学术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更熟谙英、德、俄、法、意等现代西方语言文学，在我国高等学校开辟了第一个西方文艺理论史的课堂。他言传身教，著译丰赡，是我国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

一、植根“人民性”的学术脉络

缪朗山自幼随家迁居澳门，他刻苦自修，习得多门外语，渴读诗书。1930年代末，担任澳门圣罗撒教会女子中学校长。先生教学之余，不忘读书深造，掌握西方古典学术语言，精研西学经典，透彻古今脉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人中极为罕有。时值全民族抗战烽烟正炽，先生忧国忧民，投身救亡运动，辗转桂林、重庆等地，发表文艺作品，从事抗战宣传，后在朱光潜的举荐之下，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

缪朗山作为“经师”的学术观点与其作为“人师”的典范实践相统一。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心向马列主义，应学生诉求，开设俄文班，利用现代文学课程及各类演讲场合，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并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刁难与监视，甚至短暂被捕。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期间，先生成为武汉大学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一时期，精通多国语文的缪朗山奉行“人民性”和“现实性”的学术进路。1946年8月，先生在《中国学术》创刊号上发表论文，题为《文学上独裁和民主之斗争：文学的史的发展之检讨》，署名缪灵珠。先生认为，推进文学变革的力量不在于占据优势的“少数人文化”，而系于统治集团文学洪流洋溢之下的一股潜流——“群众文化”，“人民集团文学是一切文学新运动的源头”。他不落宇宙生成论的窠臼，对希腊神话作社会历史的还原性解释，将奥林波斯神系比喻为写实的“官场现形记”：“我们看到那批懒洋洋不管正事，喝着蜜浆，坐享民间供奉的希腊神，就不由得想起现代的抛官腔，糊涂塞责，早晚喝咖啡牛乳，天天受贿赂的官僚们”。而在当时的局势下，先生对古代著名师者苏格拉底的评述，不乏自况意味：雅典哲人既有脱离群众、沉湎于形而上、由现实遁入超现实的一面，又“从形而上的梦里醒来，睁眼看到丑恶的现实”，俨然是“第一个为人民仗义执言而牺牲的学者”。

1947年5月4日，缪朗山在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第三届艺术节“五四”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

作者：赵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zhao.jing@ruc.edu.cn。

* 本刊“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缪朗山致敬。

题为《谈文学》的演讲。先生批评文艺界脱离群众的倾向，主张以“人民性”考察文学，推崇“大众化”，他指出：“中国的文学，从个性的解放到群众的觉醒，到理论检讨，到人民路线，这路线是对的”；作家应“本着自己的良心，不受旁人的威胁，不顾一切的危险，写出他在社会上看到的真实”；文艺界应秉承“五四”传统，“把文艺从少数人手里交到人民群众手里……作家应突出个人小圈子，扫清个人英雄主义，为一般文化谋前途，找出路”。

二、卓越的翻译成就

1949年，缪朗山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来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文艺理论组和西方文学组研究员。在此期间，先生用功甚勤，译作涉及文学、文艺学、考古学、数学等领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草创作出了巨大贡献。195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系1961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前身），缪朗山在文研班系统讲授西方文论，后任专职教师，并于1961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在文研班与中国人民大学期间，先生边翻译、边授课、边研究，夙夜笔耕，殚精竭思，积累了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稿。

缪朗山逝世后，其遗稿结集为四卷《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出版。这四卷译文收纳西方文论两千多年来几十位文论大家的经典名作，其中朗吉努斯《论崇高》、但丁《俗语论》、席勒《美育书简》、尼采《悲剧的诞生》，都是首次以汉语译出全文。《俗语论》至今仍只有先生的全帙译文。而先生独具灼见，选取九篇卢奇安散文，作为古代现实主义文论路线的代表，至今难见其他汉语译文。先生译笔清雅，句意晓畅，善用文言熟语，化解原典的佶屈聱牙，令后学读之欣然。

缪朗山崇尚立足一手材料，强调钻研原典，这种学风也体现在译文当中。因先生猝然辞世，美学译稿中有不少篇什未及注明翻译所据文本，是为遗憾。仅从已标注出处的诸篇，仍能看出先生的严谨徵实，能得到原文者，即从原文直译，并参考现代语言译本；若原文难寻，则从现代语言版本转译，以解学人近渴。先生在选篇时，也充分借鉴同时代国外学者的成果，但并不因循，而根据自身的教研需求，采取“拿来主义”。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诗学》是西方文艺理论开宗明义的重要著作，而多年来我国学人使用最多的罗念生译本，其极为关键的前五章译文，正是“借用缪灵珠同志的译稿，经过一些修订”（罗念生1962年《译者导言》）。而未经修订的译稿，保存在《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的第一卷中。第二章开首的半句话（1448a1），缪译为“既然摹拟者须摹拟实践中的人”，不仅反映出“摹拟”一词在原文中分词与动词的应和，更将另一分词 *práttontas* 译为“实践中的人”（缪译出注云：“‘实践中的人’或译‘行为中的人’”），极为精审。同时代学者受现代英译影响，未能充分注意“行为、行动、实践”在古希腊语中实为一词，唯有缪朗山据原文译出“实践”这一层意义，无形中为开启一场重大的思想史对话提供了契机。

三、精深的文论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朗山在学术工作中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他基于材料、基于原文、贯通中西的文论思想系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两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先生的文论著作塑造了难能可贵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也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留下了宝贵的资源与财富。

利用1950年寒假，缪朗山撰《苏联新语言学》。在这本百余页的小书中，先生崇尚现实性、人民性的文学理念在学理上得到了深化。为解释语言的流变与孳乳，先生提出“机能转借”与“意义

极化”两种原理。前者指语言“依现实的流变而流变”，后者指“有些‘语根’，其始本来只有一个中性的意义，后来渐渐发展而派生出两个意义对立的字”。先生认为，语言符号的武断性只是表象，受制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须从社会历史的观点予以考察。“转借”与“极化”，一纵一横，在先生笔下，洗脱了学理的烦琐与哲思的玄奥，又显现出理论的敏锐与建构的勇气，更与文学思想史上重视语言底层、崇尚表征现实、彻入生活日常的暖流相融汇。

缪朗山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文研班和进修班的课程讲稿（1961—1964），经章安琪整理，以《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为题于1985年出版。全书论述自古希腊罗马至18世纪启蒙运动，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人物的文艺思想，凝结了先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学所思，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专著，也是我国西方文论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史纲》的筹备和出版，正值我国学界译介西方文论的两个重要时期。与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等同类型作品相比，《史纲》源于先生的教学与翻译实践，材料翔实，亲近原典，义理透彻，其古典至文艺复兴部分一段，尤为丰富；至于法、德启蒙主义时期，则执繁驭简，择其核心人物，详加缕述。

先生治文论，勤于搜集材料，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史纲》“绪论”指出：“文艺理论是根据大量材料造出的理论，材料越丰富，分析越精细和正确，则理论越接近真理”。譬如柏拉图部分，同时期其他论者大多依《理想国》《法律篇》探讨“摹仿说”与“理念说”，依《伊安篇》《斐德若》探讨“灵感说”与“迷狂说”。唯有缪朗山注意到《巴门尼德篇》中的“分有”观念：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口告诫青年苏格拉底，哲学的最高境界不应排斥头发、污泥一类的卑鄙事物，它们亦“分有”理式。先生认为，《巴门尼德篇》的这一境界与《会饮篇》循“爱的阶梯”所能达致的最高阶段实为一致，并借用道家概念，称之为“‘齐万物’的广义的美”。先生思维通脱灵妙，融贯中西，又单刀直入，发掘出柏拉图并非全然唯心的一面，有力拓展了学术认知，这当然基于他对文献更为圆全细致的掌握。

《史纲》的撰写也与先生的翻译实践密切相契。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三章，往往被近世学者解释为“过失说”。原文中极关键的一句话（1453a9—10），缪译为“悲剧人物陷入否运，并非因其邪德败行，而是由于‘错误’”。“由于‘错误’”四字，严格忠实于原文。先生吝惜笔墨，近乎质朴，实则有其学理上的考虑。《史纲》将“错误”分为两类——明知故犯与不知而犯，并依托亚氏哲学中的潜能与实现分别解释性格与情节，暗中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解可能性：悲剧“错误”并不一定总是源于英雄个人，而可能来自家庭、命运、世界，而导向更为雄浑的悲剧观念。而近二三十年来的古希腊悲剧研究，不再奉“过失说”为圭臬，正与先生的直觉相符。

采取比较思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例证，是《史纲》的另一显著特色。在探讨莱辛《拉奥孔》“诗画关系”的部分，短短十几页中，缪朗山先后征引十多部古代文艺作品。信手拈得的诗句，配合诗画理论的曲折绵密，本身已是上乘的比较文学文章。据学生回忆，缪朗山在人民大学的课堂极富感染力，曾“用自己的身体摆出过一个惟妙惟肖的拉奥孔造型”。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凭着《史纲》这一段锦绣文章，我们仿佛也能看到他的表情。

“当忆颠沛有灵珠”——这是缪朗山早年手书赠予友人的一句诗。先生远去多年，循着这句诗，我们追索他治学为师的陈迹，愈加珍惜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精通专业知识，熟谙外国语文，思虑审辨，文笔灵妙，为同侪中的佼佼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师”；他性情通脱不羁，注重涵养德行，在文艺界声援民族抗战，在讲坛拥护解放事业，躬躬教学，成果斐然，为新中国培养大批专业人才，是当之无愧的“人师”。缪朗山传奇而典范的一生，无愧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